

## 游觀、惜生、抒懷： 論宋詩「觀漁」意象之義蘊

顏智英\*

### 摘要

「觀漁」本為周天子以祭祀為目的的禮儀；周朝以後，可能因漢人重農而輕漁之故，除梁太祖、隋煬帝、唐敬宗和宋初二帝外，正史中再無漢人皇帝有過「觀漁」之舉。但隨著宋代漁業蓬勃且突破性的發展，再加上宋詩較唐詩更富敘述性、更接近日常生活之故，「觀漁」雖成皇帝的禁區，卻在文人士大夫階層流行起來，描寫「觀漁」(以觀釣竿之外的漁事書寫為主)的詩作即多達一百餘首，遠遠超過唐詩的5首。本文分析歸納其主要意象之義蘊有三：「游觀」、「惜生」、「抒懷」，且呈顯出較唐詩更具體、多元的漁事描繪，更深刻、豐富的情意抒發等特徵；並從海洋文化、思想、詠物詩學等視角具體觀出宋代文士特有的理性主義、淑世、樂觀、寫實與創新等的精神風貌。

關鍵詞：宋詩、觀漁、游觀、惜生、抒懷

---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教授。

# Touring, Cherishing Lives, Expressing Sentiments: A Study on the Meaning of Imagery Regarding “Fishery Observation” in Song Poetry

Yan, Jy-Ing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 Abstract

“Fishery Observation” was the ritual of Zhou Sovereign for the purpose of worship. After Zhou Dynasty, there had been no official record of ethnic Han emperors “observing fishery” apart from Taizu of Later Liang, Emperor Yang of Sui, Jingzong of Tang, and the first two emperors of Song, which was likely a result of Han people’s prioritization of agriculture over fishery. Nevertheless, as fishery developed in a vigorous manner during Song dynasty and Song poetry is more narrative and closer to daily life than Tang poetry, although it became a forbidden area for the emperor, and it became a trendy activity among litterateurs and the gentry. There were over a hundred poems on “fishery observation” (mainly writings on fishery), far exceeding the number of such poems (5) in Tang poetry.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into three meanings of imagery, and it shows more specific and diverse descriptions of fishing affairs than Tang poetry, and more profound and rich emotional expre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ceanic culture, ideology, and studies in poetry on objects, we can see the unique spiritual outlook of rationalism, sophistication, optimism, realism and innovation of the literati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Song Poetry, Fishery Observation, Touring, Cherishing Lives, Expressing Sentiments

# 游觀、惜生、抒懷： 論宋詩「觀漁」意象之義蘊\*

顏智英

## 一、前言

「觀漁」本為周天子以祭祀為目的的禮儀，據《禮記·月令》：「(季冬之月)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絜美。」<sup>1</sup>可知，季冬之月魚最鮮美，親往觀漁、嗜魚，然後才薦於寢廟者，為周天子。然依《春秋》經文、傳文，「公矢魚于棠」，矢魚，或作觀魚(漁)，此觀漁者指魯隱公，非周天子，是以招致《春秋》之譏：《左傳》引臧僖伯諫阻之事並結以屈尊、遠離國都二端言隱公「觀漁」之非禮，<sup>2</sup>《穀梁傳》以捕魚為卑者事言其非禮，<sup>3</sup>《公羊傳》則以拋責遠觀、與百姓爭百金之利二端言《春秋》譏魯隱公之意。<sup>4</sup>其實，魯隱公「觀漁」乃藉簡視漁獵為手段，而以示威略地為

\* 本文為國科會(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計畫編號 MOST 111-2410-H-019-027。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建議。

<sup>1</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17，頁347。

<sup>2</sup> 《左傳》：「經(隱公)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3，頁57-60。

<sup>3</sup> 《穀梁傳》：「(經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見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2，頁21。

<sup>4</sup> 《公羊傳》：「(經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何休注：「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

目的，並無助於治兵征伐，只是縱欲逸遊而已。<sup>5</sup>影響所及，後代臣子多引隱公「觀漁」故事作為勸阻人君從事違禮游樂之例，如崔琰以「魯隱觀魚，《春秋》譏之」<sup>6</sup>諫阻曹丕田獵，魏知古以「此欲誠難縱，茲游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sup>7</sup>諷諫唐玄宗游獵於渭川之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周天子於季冬之月以祭祀為目的的「觀漁」之禮，在接下來的朝代卻不一定被納入禮制的範疇。據段銳超的說法，除梁太祖、隋煬帝、唐敬宗和宋初二帝外，正史中再無漢人皇帝有過「觀漁」之舉，這可能與漢人一般重農而輕漁有關；至於宋太祖、太宗之「觀漁」，實與觀麥、觀燈、觀水戰等一樣，是一種體現皇帝與官民同樂的「游觀」娛樂活動，但這些活動很容易被人與逸樂享受聯繫在一起，太祖、太宗之後，「觀漁」便突然在宋史中銷聲匿跡了。<sup>8</sup>

雖然，「觀漁」成了皇帝的禁區，但隨著宋代漁業蓬勃且突破性的發展，<sup>9</sup>「觀

文印書館，1989），卷3，頁34。

<sup>5</sup> 詳參楊希牧：〈春秋隱公射魚於棠說駁議〉，《先秦文化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501-534。

<sup>6</sup>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368。

<sup>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3063。

<sup>8</sup> 詳參段銳超：〈「觀漁」之禮的興衰及其深層原因探究〉，《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6：6（2014.12），頁118-119。

<sup>9</sup> 宋代漁業突破性的發展特徵，大致有四：第一，是一部分農民成為賴漁為生的捕魚專業戶，且漁戶們已有用「大罟」聯合捕魚的能力；第二，是淡水養魚業的推廣，掌握了魚苗的培育技術；第三，是沿海捕魚業已初具規模，並對當時政治、經濟產生一定影響；第四，「漁行」的出現標誌漁產品買賣的專業化與流通機制的流通性。詳參魏天安：〈宋代漁業概觀〉，《中州學刊》6（1988.12），頁108-112。尤其指南針於北宋後期開始應用於航海，更促成近海甚或遠洋漁業之變革，如朱或《萍洲可談》：「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宋·朱或：《萍洲可談》，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065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卷2，頁382。趙汝適《諸蕃志》：「海南……南對占城，西望真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測，晝夜守視惟謹，毫釐之差，生死繫焉。」宋·趙汝適：《諸蕃志》，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602冊，卷下，頁333-334。吳自牧《夢梁錄》：「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釐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繫也……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稍差，即葬魚腹。」宋·吳自牧：《夢梁錄》，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598冊，卷12，頁594。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五年癸卯夏五月廿八日庚辰）是夜，洋中不可往，惟視斗星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602冊，卷34，頁277。

漁」活動卻在文人士大夫階層流行起來；再加上宋詩較唐詩更富於敘述性、更接近日常生活，<sup>10</sup>因而描寫「觀漁」的詩作即多達一百餘首，遠超過唐詩的 5 首，<sup>11</sup>而且在承繼唐詩「游觀」、「惜生」、「抒懷」等三個主要「意象」<sup>12</sup>的義蘊中又有更豐富而多樣的內涵體現，十分值得探討。此外，就詠物視角言，宋代「觀漁」詩作的大量增加，也意味著宋詩人對物的觀察興致已從陸地的花、鳥等延伸至水中的「魚」等水族了，張高評曾指出：「六朝詠物詩，以巧言切狀，著題描寫為主；唐人詠物，加之以抒情詠懷；至宋，則側重托物寓意，藉物說理」，<sup>13</sup>筆者初步觀察百餘首宋代「觀漁」詩作，發現除少數從審美角度承唐詩書寫懷人懷居、隱退之感的「抒懷」作品外，大多數是藉歌詠特殊漁法與品嚐魚膾之鮮來傳達其「游觀」之興味與寓意，以及藉書寫魚之不幸、人之暴殄生靈以生發「惜生」戒殺之議論，在異於前朝「抒情」的、較偏重「寫實」的風格中所反映的海洋文化與思想內涵，亦值得深究。可惜目前學界關於「漁」意象的研究，多聚焦於「唐詩」、「宋詞」，<sup>14</sup>較少關注「宋詩」者，更未見有針對宋詩「觀漁」意象所作的研究，因此，本文擬就一百多首相關宋詩為考察文本，並選擇約三十首為代表，結合詩人的寫作背景，分析歸納其意象之義蘊，並從海洋文化、思想、詠物詩學等視角具體考察其內涵與特徵。特別一提的是，因篇幅所限，本文研究文本大致排除了觀賞個人垂釣的詩作，而以觀釣竿之外的漁事書寫為主。

<sup>10</sup> 詳參〔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第三節〈宋詩的敘述性〉、第四節〈宋詩與日常生活〉，頁 9-21。

<sup>11</sup> 就筆者所見，唐詩「觀漁」作品僅杜甫〈觀打魚歌〉與其續作〈又觀打魚〉、白居易〈松江亭搗樂觀漁宴宿〉與〈池上寓興二絕〉其一、韓愈〈叉魚招張功曹（署）〉等 5 首。

<sup>12</sup> 「意象」，是「作者的意識與外界的物象相交會，經過觀察、審私與美的釀造，成為有意境的景象。」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頁 3。經常合「意」與「象」為一以稱之，且多偏指其「意」或偏指其「象」；本文主要在探索其「意」，故主標於「意象」之後再加「義蘊」二字，以更清晰寫作用意。

<sup>13</sup>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 485。

<sup>14</sup> 唐詩「漁」意象的研究如：毛俊玉〈從「歷史的漁翁」到「文學的漁翁」——論唐詩的漁翁意象〉、王世官《唐詩中的魚文化研究》、李紅霞〈論唐詩中的垂釣意象〉、張希、馮淑然〈唐代漁釣詩詞中的意象解讀〉、高宏濤〈唐代詩詞中的「漁父」意象探析〉等；宋詞「漁」意象的研究如：楊瓊《宋詞漁意象研究》、吳丹《宋代漁父詞研究》、梁歡華《志不在魚——宋詞漁釣意象研究》、張冬梅《宋代漁父詞研究》、任秀蓉《宋詞中漁釣意象的六種意象組合》等。

## 二、游觀漁法之興味與寓意

「觀漁」作為游觀嗜鮮的娛樂活動，在唐、五代民間已可見，如高適〈東征賦〉有「人多嗜艾，俗喜觀漁」<sup>15</sup>之語，孫光憲《北夢瑣言》亦記張溫「曾作客館鎮將，夏中携賓觀魚」<sup>16</sup>之事，但唐詩中書寫「觀漁」之興的作品並不多，目前僅見白居易（772-846）〈松江亭攜樂觀漁宴宿〉一首：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鱸紅鯉，夜燭舞青娥。雁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sup>17</sup>

本詩作於寶曆2年（826）冬詩人因眼病免蘇州刺史，回鄉途中遇劉禹錫遂結伴遊揚州、楚州之時。<sup>18</sup>詩以「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寫太湖松江漁場中水面罾網密佈、船頭文士雲集「觀漁」的熱鬧景況；末六句寫斫鱸嗜鮮、歡歌妙舞的宴會清興，也暗示了詩人卸除官職後的輕鬆愉悅。

可惜，上述唐詩側重的是游觀後嗜鮮的清興，對於「罾」之漁法未有具體描述，弦外之音亦較隱晦。及至宋代，此類表現游觀興味的詩作驟增至近二十首，雖也有不少像上述白詩側重書寫嗜鮮的清興之作，<sup>19</sup>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批加寫特殊漁法且寄託具體施政寓意的詩作，兼具了海洋文化與海洋詩學的價值。這類詩人多在朝或在地方擔任過重要官職，如北宋詩人宋祁（998-1061），即結合「鳴榔」、「槩」

<sup>15</sup> 唐·高適：〈東征賦〉，《高常侍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101冊，卷9，頁420。

<sup>16</sup> 五代·孫光憲著，林艾園校點：《北夢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169。

<sup>17</sup>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1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447，頁5033。

<sup>18</sup> 詳參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169-170。

<sup>19</sup> 如：趙汝回〈游列真觀劉道士拉上潮際觀漁〉云：「……夜報前溪漁，命酒將鱸享。撐篷待月來，架槳乘潮上。秋高氣淒澹，清極思超敞。暫廢一夕眠，庶蒙列真獎」。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3012。朱熹〈次圭父觀魚韻〉云：「鳴榔不用齊吳榜，鼓柁何須學楚謳。便有金盤堆白雪，却憐清泚向東流」（《全宋詩》，卷2388）、韋驥〈和因觀單魚斫鱸二首〉云：「一丈深溪一尺魚，不論高價只愁無。携來縷作霜盤膾，美玉紛紛得所沾。……今朝大嚼有餘興，佳句復出文章翁」（《全宋詩》，卷730）、袁說友〈觀漁舟得巨魚〉云：「橫舟排雪浪，敏手奪銀刀。過熟偏宜酒，餘鮮更帶糟」（《全宋詩》，卷2576）。以下凡引自《全宋詩》者，皆直接以括號註明卷數，不另加註。

等捕魚輔助工具以描繪其所見「鷓鴣漁法」之巧，其〈答程職方冬至前一日江上觀魚〉云：

歲晏修漁事，邀賓俯碧流。鳴榔截橫浦，叢樛聚寒洲。舴艋爭離合，鷓鴣巧泛浮。自注：漁子又以鷓鴣捕魚，探頸而取之。魴來比河上，鱸出似槎頭。雪膾供庖俎，梅齏促宴甌。言詩知有意，不為百金求。（卷 220）

宋祁歷官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知制誥，修《新唐書》成後，進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期間曾知壽州、許州、亳州、定州、益州等地，此詩即作於知益州（今成都）時期。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8月，皇帝加封他為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由定州改知益州。<sup>20</sup>益州在五代時倖免於兵燹，為經濟發展積澱了很好的條件，至北宋時期，其經濟已發展至相當高的程度，美麗的山水與安逸的社會經濟環境，使宋祁在閑暇之餘寫下大量詩歌。上引詩即為喜好宴游的宋祁，<sup>21</sup>趁著歲末魚兒肥美之際邀集賓客「觀漁」與嚐鮮之作，尤其著重漁法與捕魚過程的描寫：漁人以「舴艋」載「鷓鴣」至江面捕魚，<sup>22</sup>再搭配以長木擊船舷令魚受驚的「鳴榔」聲，<sup>23</sup>以及聚積柴木於水中圍捕取之的「樛」漁法，<sup>24</sup>因而捕獲「魴」與「鱸」等可作鮮膾佐酒的美味。「觀漁」的清興之外，宋祁更在詩末反用魯隱公「觀漁」遭《公羊》譏「求百金」、與百姓爭利之典表達己「觀漁」純屬游樂、未與民爭利之施政寓意。其實，民本思想為宋祁政治思想的核心，<sup>25</sup>因此，他並未因一生四入翰林卻始終未能入二府

<sup>20</sup> 宋·宋祁：〈益州謝上表〉，《景文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17 冊，卷 38，頁 608。

<sup>21</sup> 宋·魏泰《東軒筆錄》卷 5 載宋祁：「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宴游，以矜持自喜。」宋·魏泰著，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71。

<sup>22</sup> 「鷓鴣」，是一種容易馴化的水鳥，約於魏晉時在秦嶺以南河源地開始用以捕魚；到唐代，被進一步推廣到全國各地。蘇永霞：〈從《全唐詩》看唐代漁業〉，《農業考古》8（2010.8），頁 223。鷓鴣善於游泳、潛水，經常潛入水中捕魚，通常用於急流、河床岩石多、難於下網的水域。楊瑞堂：〈我國古代捕魚技術的研究〉，《古今農業》2（1989.7），頁 125。

<sup>23</sup> 陳憲春：〈從唐代詩人詠漁具談行漁工具的衍化與發展（上）〉，《漁業機械儀器》8（1988.8），頁 17。

<sup>24</sup> 「樛」，古時亦名「罽」、「檣」或「洩」。現今習慣叫「罽子」或「禁湖」。始於春秋戰國時代，《爾雅·釋器》：「樛謂之洩」，晉郭璞注：「今之作樛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裡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見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 5，頁 76。

<sup>25</sup> 「客有問臣曰：『民生有本乎？』臣曰：『力田為生之本也。』『王道有初乎？』臣曰：『養生王道之始也。』」宋·宋祁：〈大有年頌〉，《景文集》，卷 34，頁 572，借用主客答問形式表達其民本思想。

而遺憾，反而在九歷州郡、仕途偃蹇之際，依然積極為官，心繫百姓，所到之處皆有政聲；知益州3年，更是「即學官」、「束奸吏」、「裕農政」<sup>26</sup>，深得成都百姓愛戴，甚至在思賢閣增列其畫像，<sup>27</sup>由此可見宋祁勤政愛民之心，與其「不為百金求」之詩意。

此等深摯的「淑世精神」，亦即「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其實是大部分宋代士人，尤其是傑出精英們內在的精神面貌。<sup>28</sup>再舉蘇轍（1039-1112）為例說明。他藉公暇游觀濟南大明湖「旋箔漁法」之事，寄寓其以民為己任的政治姿態，〈西湖二詠其一·觀捕魚〉云：

西湖不放長竿入，羣魚空作淘河食。漁人攘臂下前汀，蕩漾清波浮兩腋。藕梢菱蔓不容網，箔作長圍徒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踊躍長魚一夫力。柳條穿頰洗黃金，鱗縷堆盤雪花積。燒薤香橙巧相與，白飯青蔬甘莫逆。食罷相携堤上步，將散重煎葉家白。人生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卷853）

蘇轍歷任制置三司條例司屬官、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御史中丞、尚書右丞、門下侍郎等，亦隨張方平、文彥博等人歷職地方。此詩作於熙寧6年（1072）至9年10月齊州掌書記期間，蘇轍久慕齊魯，期盼能至濟南任職，曾於〈舜泉詩並敘〉云：「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sup>29</sup>對於齊州山水風物深致嚮往；上引詩中「藕梢菱蔓不容網，箔作長圍徒手得」二句，即特寫親臨所見大明湖（時稱西湖）特殊的「旋箔漁法」。該漁法又稱「迷魂陣」、「擺龍門陣」，為一種淺

<sup>26</sup> 宋·吳師孟：〈宋尚書畫像贊〉，宋·袁說友：《成都文類》，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396冊，卷48，頁810。

<sup>27</sup>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成都思賢閣圖太守真四十有一，宋景文在第三十八位，經史閣圖范文正公像，蓋公仲子純仁漕蜀時，邦人請繪者，諸生歲時過學宮謁焉。」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600冊，卷108，頁718。

<sup>28</sup> 王水照指出，其原因應與宋代「祖宗家法」（治國綱紀、安邦法度等）的「近代」指向有關，例如：以廣大庶族士人為基礎建立的文官政府、相對民主自由的君臣氣氛、強調儒家重教化的政治理想、崇尚氣節與人格的群體自覺等等。詳參王水照：〈「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與文學中的淑世精神——宋型文化與宋代文學之研究〉，《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頁2-20。

<sup>29</sup> 宋·蘇轍：《欒城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142冊，卷18，頁201。

水的定置漁具，源於漢代韓信使敵軍自入牢籠的「龍門陣」，原理是利用魚類喜歡逆水上游的習性，在它們必經之道設竹箔或葦箔，擋住其出路，誘魚到特製的取魚部分進行捕魚。詩中的「箔作長圍」即「長箔」，是攔住魚類去路的阻擋物；另有「箔圈」是在長箔的適當處所開的幾個較大迂迴區，「箔窩」則是在箔圈後方開的一小口，為取魚的部位。<sup>30</sup>詩人以一半的篇幅詳述該漁法的捕魚過程，可見其高昂的觀漁興致；而在品嚐風味鮮美的漁獲膾縷之後，更發出「人生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的滿足與感觸，清王士禛《居易錄》云：「蘇子由官齊州，亦有西湖諸詩。……〈西湖觀捕魚〉、〈食雞頭〉、〈踏藕〉凡八九篇，……其于吾州亦不薄矣。」<sup>31</sup>肯定了蘇轍對濟南山水風物的游觀熱愛之情。其實，蘇轍初至齊州任所時，即因旱災饑荒而忙於政務，與其之前擔任陳州府學教授的「清淨」、「安閒」形成強烈的對比，<sup>32</sup>根本無暇出游，必須等到災荒已過、百姓生活穩定後，才能利用公暇來觀漁品膾，從而使身體原先緊繃的神經得到舒展，因此，詩末的感觸也透顯出詩人戮力從公、百姓為先的從政態度。

及至南宋，由於外患重重的威脅，詩人游觀漁法所寄寓的政治心理，又多了一層國族的危機感。例如楊萬里（1127-1206）〈垂虹亭觀打魚斫鱸四首〉，藉書寫「聯合捕魚」之趣，以暗示詩人冬日不得不迎送金使的苦中作樂心理：

橋柱疏疏四寂然，亭前突出小魚船。一聲磔磔鳴榔起，驚出銀刀躍玉泉。  
六隻輕舸攬四旁，兩船不動水中央。網絲一撒還空舉，笑得倚欄人斷腸。  
漁郎妙手絕多機，一網收魚未足奇。剛向人前撰勳績，不教速得只教遲。  
鱸魚小底最為佳，一白雙腮是當家。旋看冰盤堆白雪，急風吹去片銀花。  
吳人號鱸膾曰玉膾，太湖鱸魚四腮通白色，肉細味美不腥，松江鱸三腮黑脊，肉粗味淡而腥，

<sup>30</sup> 邢湘臣：〈我國古代幾種特殊的漁法〉，《農業考古》1（1986.4），頁251。

<sup>31</sup> 清·王士禛：《居易錄》，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889冊，卷33，頁823。

<sup>32</sup> 在〈自陳適齊戲題〉、〈寄孫朴〉二詩中，蘇轍則把自己在陳州任府學教授時的「清淨」、「安閒」與在齊州掌書記時所受的「磨折」作了對比：「陳風清淨眠真足，齊俗強梁懶不容。久爾安閑長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憶昔補官太皞墟，泮宮蕭條人事疏。日高鼾睡聲噓噓，往還廢絕門無車……官居一去真蓬廬，東來失計悔厥初。夜聞桴鼓驚閭閻，事如牛毛費耘鋤」。（卷853）

見圖經。<sup>33</sup>

詩中描述詩人坐在江心橋上「垂虹亭」<sup>34</sup>中觀賞 8 艘漁船聯合捕魚的奇觀。這種「聯合捕魚」的方式從北宋開始發展起來，<sup>35</sup>由於魚類資源豐富，故而小魚不在主要捕獲之列，漁人們專捕大魚，且經常集體行動，例如北宋劉放〈觀魚〉曾描寫襄州漁戶以大罟聯合圍捕的壯觀畫面：「開門漁師百舟入，大罟密罟雲霧集。小魚一舉以千數，赤鯉強梁猶百十」（卷 605），又如華鎮〈陪潭倅張朝散江皋觀魚〉亦有陪潭倅觀賞「合圍」捕魚的奇景書寫：「合圍緩覺波心遠，數獲豐知網目寬」（卷 1085），皆從視覺面強調此漁法的漁獲特豐；但楊萬里卻以「磔磔鳴榔」的聽覺、「六隻輕舸攪四旁，兩船不動水中央」的動靜態對比，生動地描繪出「合圍」捕魚過程的趣味，還以「笑得斷腸」、「妙手多機」等提煉形象的方式，「以形寫神」，<sup>36</sup>寫出觀者、漁郎的歡快神情，呈顯出詩人所見具有活力的萬物生命情態以及詩人的純真心境，此即錢鍾書稱道楊萬里的：「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親母子的骨肉關係，要恢復耳目觀感的天真狀態」。<sup>37</sup>楊萬里曾任太常博士、廣東提點刑獄、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秘書監等職，官至寶謨閣學士；據于北山《楊萬里年譜》，此詩作於孝宗淳熙 16 年（1189）11 月詩人任秘書監、奉命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後，12 月 6 至 25 日左右歸舟經淮陰、抵嘉興之際，<sup>38</sup>迎送金使本是既屈辱又艱苦的差事，<sup>39</sup>時年已 63 的楊萬里，卻仍能苦中作樂、歡快觀漁，並以「旋看水盤堆白雪，急風吹去

<sup>33</sup> 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28，頁 302。

<sup>34</sup> 垂虹亭，位於吳淞江長橋之上，由王廷堅建於慶曆 8 年，長千餘尺，為三吳絕景之一。

<sup>35</sup> 魏天安：〈宋代漁業概觀〉，頁 108。

<sup>36</sup> 李澤厚在論及「以形寫神」時曾云：「要突破形象的有限，就不能只著重在表面的外形模寫或場面鋪張上——在『形似』上作文章，而更應盡量使形象具有深度，盡量提煉形象，使它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表達出豐富的生活真實。也就是使形來傳神。」李澤厚：《美學論集》（臺北：三民書局，1996），頁 365。

<sup>37</sup>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頁 161。

<sup>38</sup> 于北山：《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76。

<sup>39</sup> 據胡傳志的研究，楊萬里接送金使的行程主要有四個階段，分別為：（一）臨安-盱眙：淳熙 16 年 11 月 12 日-12 月 5 日，（二）盱眙-臨安：12 月 6-25 日，（三）臨安-盱眙：紹熙元年正月 7-23 日，（四）盱眙-臨安：紹熙元年正月 24 日-2 月 11 日，共約 77 天，往返 4 次，又逢寒冬，頂風冒雪，應備極艱苦。詳參胡傳志：〈論楊萬里接送金使詩〉，《文學遺產》4（2010.7），頁 62-64。

片銀花」的優美聯想描寫魚片之薄，令讀者想見其品嚐鱸魚刺身的清興與快意，也凸顯其熱愛山川奇觀、<sup>40</sup>幽默樂觀看待政務與人生的精神風貌。<sup>41</sup>

再如方岳（1198-1262），則以所觀漁人訓練「鷓鴣」之得法，傳達其殺敵之壯志難酬的苦悶，其〈觀漁〉云：

林光漏日煙霏濕，鷓鴣族立春沙碧。湘竿擊水雪花飛，鷓鴣沒入春溪肥。銀刀撥刺爭三窟，烏兔追亡健於鶻。搜淵剔藪無噍類，餘勇未厭心突兀。十五五斜陽邊，聽呼名字方趨前。吐魚筠籃不下咽，手掉瑣碎勞爾還。嗚呼奇哉子漁子，塞上將軍那得爾。（卷 3219）

方岳以詩歌形式並妙用譬喻、擬人等修辭，敘述其親見鷓鴣捕魚的全過程——訓練有素地待命、如鳥飛兔走般敏捷的身手、較鶻鳥更凶猛的勇力、如戰士般服從號令從口中吐交戰利品。這樣的描繪，較沈括《夢溪筆談》的記錄：「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使捕魚，信然。」<sup>42</sup>來得更加鮮活生動，栩栩如在目前。結尾二句，尤為詩人深意所在，方岳曾為文學掌教，後任袁州太守，官至吏部侍郎，然因個性剛直勇毅，有浩然正氣，能直面權奸，「前遭（史）嵩之喉論罷歸，後遭（丁）大全喉論罷下郡，中遭（賈）似道之劾，兩調邵武，幾不能一日安於位也」，<sup>43</sup>因此，主戰卻報國無門的方岳由讚嘆漁人善於馴養、指揮「鷓鴣」而慨嘆並諷刺當時守邊將帥之無能，委婉表達出身處內有奸臣、外有侵擾的動盪時代中強烈的用世之心。

<sup>40</sup> 宋·楊萬里《誠齋集·朝天續集序》言此迎送金使之行令他：「始得觀濤江，歷淮楚，盡江東西之奇觀。」宋·楊萬里：《誠齋集》，卷 82，頁 87。

<sup>41</sup> 楊萬里的幽默，可從《鶴林玉露》卷 6 的一則記載觀出：「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誠齋戲呼延之為蝥蟬，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蝥蟬無腸也，一坐大笑。」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885 冊，頁 221-222。另楊萬里云：「公子近來惟說病，老夫秋至不曾悲。人生隨分堪行樂，何必蘭亭與習池。」宋·楊萬里：〈和張功父病中遣懷〉，《誠齋集》，卷 23，頁 249、「無求不必位三公，一飽何須祿萬鍾。只有人生安樂好，享他明月與清風。」宋·楊萬里：〈五月十六日，病中無聊，起來步月〉五首其二，《誠齋集》，卷 42，頁 459。則可見其樂觀的精神。

<sup>42</sup> 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 16，頁 166。

<sup>43</sup> 宋·方岳撰，秦效成校注：《秋崖詩詞校注》（合肥：黃山書社，1998），頁 676。

### 三、敬物惜生之思考與議論

#### (一) 由惜魚而惜人

詩人「觀漁」，還有因目擊捕魚、殺魚過程而生發敬物惜生與勸戒殺生縱樂之意者，如白居易〈池上寓興二絕〉其一：「濠梁莊惠謾相爭，未必人情知物情。獺捕魚來魚躍出，此非魚樂是魚驚。」<sup>44</sup>表達了敬物惜生之思。唐詩中此類詩作雖屈指可數，但杜甫（712-770）〈觀打魚歌〉與其續作〈又觀打魚〉卻對後代詩人頗有影響，仿作者多，杜詩云：

絲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鱗鱗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卻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回風颯颯吹沙塵。饕子左右揮雙刀，膾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失。（〈觀打魚歌〉）

蒼江魚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戈兵革鬪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又觀打魚〉）<sup>45</sup>

二詩作於唐代宗寶應元年（762），杜甫自成都送嚴武入朝，行至綿州（今四川綿陽東），徐知道兵變，只好暫依綿州刺史杜濟，於綿州東津觀漁而賦。清代黃生云：「二詩體物既精，命意復遠，前詩寓感，此詩（又觀打魚）寓規。」<sup>46</sup>依徐國能的詮釋，前詩「寓感」乃嘆魴魚因味美而遭捕殺，從此不得江湖之樂；後詩「寓規」則勸人莫因一時貪欲而暴殄生靈。<sup>47</sup>杜甫以「為捕魴魚而盡棄眾魚」、「萬魚急」的困窘，呈

<sup>44</sup>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14冊，卷459，頁5225。

<sup>45</sup>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7冊，卷220，頁2314。

<sup>46</sup> 清·黃生：《杜工部詩說》（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頁167。

<sup>47</sup> 徐國能：〈杜甫歌行詩後世模擬析論——以〈觀打魚歌〉、〈又觀打魚〉為例〉，《文與哲》26（2015.6），頁188。

現魚的不幸遭遇，從而生發勸戒殺生縱樂之意，成為後代詩人「惜生」主題書寫的典範。

及至宋代，此類「惜生」詩作驟增至十多首，這方面的詩人多具深厚的道學修養，有著「仁民愛物」之思，其描寫的觀漁重點看似不出杜詩的範圍，實則在承受其影響中更有其新創之處，誠如程千帆〈模擬（論模擬與創造）〉所言：「文化有持續，思想有連類，任何文學作品，不能不受前人之影響，自亦不免與後人以影響」，<sup>48</sup>而宋詩在杜詩影響下的新創處，就在於漁事過程描寫更加生動、對人類貪婪的譴責更加深刻，以及由惜「魚」進而惜「人」的關懷拓展。例如北宋詩人劉敞（1019-1068）即生動地記錄因歲終「膾臘」<sup>49</sup>祭祀所需而打魚的過程，〈打魚〉詩云：

南人登魚作膾臘，清潭數里奔舟楫。層冰始解川氣和，百尺分明見鬢鬣。大網如雲遮要津，須臾牽網迴水濱。地高勢蹙漸逼窄，忽復逸出黃金鱗。釣叟篙師共驚駭，失聲奪氣俱逡巡。素魴赤鯉不足數，弃擲千萬如埃塵。豈知異物通變化，時暫網中還有神。（卷 476）

劉敞在經學、史學、文學、金石學方面成就頗高，尤以經學見長，更著力於《春秋學》，<sup>50</sup>是以深諳儒家傳統的治世之道；同時，與梅堯臣、歐陽修在詩歌創作上皆繼承杜甫詩的現實主義精神，具有動憂蒼生、有感而發的一面，<sup>51</sup>此詩即繼承杜甫憂「眾魚被棄」的書寫特質。但不同的是，更以示現修辭將漁人忽見「黃金鱗」逸出大網而驚駭退卻的捕魚畫面，寫得活靈活現，如在目前。還有劉敞之弟劉攽（1022-1088）對觀漁過程亦有生動的刻劃，詩中除了繼承杜甫憂「萬魚急」的書寫特質外，更以百舟競捕的壯觀畫面對比魚的痛苦，詩云：

<sup>48</sup> 程千帆：《文論十箋》下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227。

<sup>49</sup> 古代的兩種祭名，祈穀食新曰膾，歲終時合祭眾神曰臘。其祭多在歲終，故常並稱。古時貧民，必待「膾臘」方得飲酒食肉。《韓非子·五蠹》：「夫山居而谷汲者，膾臘而相遺以水。」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83），頁 340。

<sup>50</sup> 劉敞有經學著作：《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春秋傳說例》、《七經小傳》、《公是弟子記》等。

<sup>51</sup> 劉敞〈寄王二十〉云：「昔借君家杜甫集，無端臥疾不曾編。近從書上吳員外，復得遺文數百篇。夫子刪詩吾豈敢，古人同疾意相憐。」（卷 484）可見其對杜甫現實主義的推崇。

萬魚挂網同時急，赤鯉長大猶人立。舊疑古潭有神物，倏見金鱗却騰入。檝師獻功喜相顧，岸傍歡聲仍坌集。（〈城東觀魚〉，卷 605）

清濠環城四十里，蒹葭蒼蒼天接水。使君褰帷乘大舸，觀魚今從北闕起。開門漁師百舟入，大罟密罾雲霧集。小魚一舉以千數，赤鯉強梁猶百十。濁醪賞功傾瓦壺，公言錫爵爭歡呼。餘人不及色沮喪，數奇天幸相賢愚。濃雲吹雨寒蕭散，置酒移船泊前岸。暴殄天物古所矜，誰道於今為壯觀。（〈觀魚〉，卷 605）

劉攽成長於奉儒守官的家庭，博覽五經，更精於史學。<sup>52</sup>有儒家事君「治民」<sup>53</sup>的抱負，不僅為官治民有術，<sup>54</sup>還能由仁民而愛物，展現民胞物與之胸懷，上引二詩即具現其敬惜物命之思。二詩作於元豐 8 年（1085）哲宗即位、詩人起知襄州（今湖北襄樊）之時，描述襄州漁戶聯合捕魚的情景，寫的是「由官府組織的一次捕魚比賽觀賞活動，不是生產性捕撈」，<sup>55</sup>詩人善用對比修辭，以上百漁船競捕的壯觀場面、檝師獻功的欣喜與失敗者的沮喪表情、岸傍觀眾的歡呼聲，來對比千萬小魚被大罟密罾網住難以脫身的急切、大型赤鯉倔強挺立漁網中的痛苦掙扎，更鮮明地凸顯出被網之「魚」的可憐遭遇。

更具特色的是兩宋之際的理學家楊時（1053-1135）的觀漁詩，不僅書寫「萬魚急」的困窘情態，還強調人類的貪婪，譴責人類為口腹私欲而違反天理，〈鄱陽湖觀打魚〉云：

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脊。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紛紛漁舟子，疑若俛可拾。橫湖沉密網，脫漏百無十。蟲蝦雜魴鯉，駢首吐微濕。小人利口實，刀機污鱗鬣。鯤鯨亦狼狽，風雨移窟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噓吸。胡寧飽

<sup>52</sup> 劉攽除了參與《資治通鑑》的編撰、得到很高的評價外，還校勘過《魏書》、《北齊書》，著有《東漢刊誤》、《後漢書》精要、《五代春秋》、《內傳國語》、《經史新義》、《漢官儀》等。

<sup>53</sup> 劉攽〈京東運使謝上表〉言己：「志在詩書，本求名于稽古，耳剽律令，亦有意于治民。」見宋·劉攽：《彭城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25 冊，卷 25，頁 747。

<sup>54</sup> 陳師道〈彭城移獄記〉載：「劉叔貢父為曹州，盜賊衰息，犴獄屢空。或問弭盜之術？叔貢父曰：『吾何求焉，不以重地視之而已。』」見宋·陳師道：《後山集》，收入《後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 12，頁 668。

<sup>55</sup> 魏天安：〈宋代漁業概觀〉，頁 108。

羶香，忍視萬魚急。幽潛不足恃，感嘆百憂集。寄謝漆園吏，於計未為得。  
(卷 1144)

楊時是程門高弟，在傳承洛學的學術活動中建立了自己的理學體系，編訂《伊川易傳》、校訂《河南程氏粹言》。作為一個理學詩人，其詩多含哲理意味，尤其是儒學以「仁」為核心的哲學思維，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要人們以善道對待自然萬物，方可共利共生。<sup>56</sup>他對於程顥提出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頗有體悟，從而強調物我同體的自然生態觀，也由此主張人類應「去勝心」、「循天理」，<sup>57</sup>行事方無窒礙。「勝心」，即私慾之心，若追求過多則妨天理。因此，以「密網」使眾多鱗介難以脫漏、貪得無厭的漁舟子，遂為詩人譴責的對象。楊時將「鯤鯨」等擬人化，寫其狼狽遷居以避「刀機」之災的不安，生動傳達出人類為「口實」之利與「羶香」之慾而「忍視萬魚急」的不該，展現詩人「民胞物與」、反對捕獲過多之思。楊時的三傳門人朱熹亦有〈次圭父觀魚韻〉詩云：「平生三伏斷追遊，誰喚來穿澗樹幽。初訝網橫天影破，忽驚人蹴浪花浮。鳴榔不用齊吳榜，鼓枻何須學楚謳。便有金盤堆白雪，却憐清泚向東流。」(卷 2388) 也以橫天大網驚嚇原本悠遊的魚兒、捕獲過多破壞生態平衡的書寫傳達出類似的惜生之議。

南宋詩人書寫觀漁時的「惜生」之思，亦多從人類貪婪的視角著眼，且能善用修辭手法描繪魚之窘狀。例如孫巖（?-?）特寫一位已是中豪之家的漁師仍處心積慮欲捕獲大黃魚的貪心形象，〈觀漁行〉云：

霜降平湖鑑羣象，中有黃魚幾一丈。漁師早已中豪家，今日連舟布新網。東西南北三重圍，圍形漸縮如小池。孟獲身窮呂布窘，尚許性命延斯須。舊與鱒魴同出入，爾暇悲憐禍相及。日斜創甚上平沙，兩岸居人如堵立。渺渺腥風吹水雲，賣魚沽酒賽湖神，醉來預唱江南春。(卷 3660)

<sup>56</sup> 楊時提出：「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見明·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龜山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952。

<sup>57</sup> 楊時云：「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於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明·黃宗羲：《宋元學案·龜山學案》，頁 949。

為了捕獲丈高的大黃魚，漁師一早即布置好連綿的舟船與新網。可憐的黃魚，被新網從東西南北各方面圍得密不透風；漁船們更逐漸縮小網圍、步步進逼，令其更加艱困難逃。詩中還以「孟獲」身窮於孔明、「呂布」窘困於曹操等典故形容「黃魚」圍捕於漁師，形象而概括地呈顯其罹禍之狀，也暗寓詩人反對暴殄生靈之想。再如詩人兼哲學家的楊萬里，也藉刻劃十里塘漁者對萬魚趕盡殺絕的貪得無厭，傳達其憐惜魚命之意，詩云：

銀塘打盡萬銀梭，岸上筇筍來正多。船載月明猶有月，無船無月欲如何。（〈十里塘觀魚〉）<sup>58</sup>

漁者都星散，那知不是真。忽然重舉網，何許有逃鱗。暗灑泥中玉，光跳日下銀。江湖無避處，而況野塘濱。（〈再觀十里塘捕魚有嘆〉）<sup>59</sup>

二詩作於淳熙 16 年 8 月楊萬里由筠州被召回京途經江西省南昌市之時。<sup>60</sup>詩序云：「予晚宿十里塘姜店，見漁者紛集，勞而無獲，蓋塘主已盡其利，因不禁漁者故也。嘲以絕句。」十里塘中的千萬銀鱗於泥中掙扎、跳躍，然而在塘主、眾漁者的重重網捕下，根本毫無逃避之處，無一能倖免於難。詩人運用「那知」、「何許」等設問手法，提醒讀者留意漁者的心機與貪心。于北山《楊萬里年譜》也指出，詩人此行「一路為詩，多言景物。又欣稻穀之豐登，慨徵科之酷虐」，<sup>61</sup>楊萬里對儒學經典《周易》的深究與哲學思維，集中體現在其著作《誠齋易傳》與《庸言》中，也融入其詩歌創作裡。他對於物我關係本就有獨特的思考與見解，《庸言》云：「人者，天地之心也」、「觀吾心，見天地；觀天地，見吾心」，<sup>62</sup>《跋豐城府君劉鑑十詠》亦云：

<sup>58</sup>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 26，頁 277。

<sup>59</sup>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 26，頁 277。

<sup>60</sup> 淳熙 15 年（1188）3 月，孝宗採納洪邁之議，以呂頤浩等人配饗高宗廟祀；楊萬里力爭主戰名相張浚當配饗，指斥洪邁為人不公正、專輒獨斷，無異「指鹿為馬」，因此惹惱孝宗。孝宗云：「萬里以朕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閣，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淳熙 16 年 2 月，孝宗禪位於太子趙惇（即宋光宗），楊萬里於五月復直秘閣，8 月被召，9 月入京。詳參元·脫脫等：《楊萬里傳》，《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 433，頁 12868-12869。

<sup>61</sup> 于北山：《楊萬里年譜》，頁 375。

<sup>62</sup> 分別見宋·楊萬里，《庸言》十三、十二，《誠齋集》，卷 94，頁 236、235。

「豐城府君愛山成癖，不知身之化為山歟，山之化為身歟？」<sup>63</sup>可謂視自然萬物為親友，對之注入滿腔情愛。因此，詩人十里塘觀漁，將境遇可憐的魚進行擬人化的特寫，並揣摹魚兒「江湖無避處」的心思；在憐惜魚命、嘲諷塘主漁者貪婪的同時，也暗示己身「倦仕思歸」<sup>64</sup>的心志。

宋代詩人對杜甫「觀漁」書寫的創新，更展現在由惜「魚」進而惜「人」的關懷對象拓展。如梅堯臣〈送萬州武寧段尉希元〉所云：「臨水必觀魚，獨傷魚命輕。朝為淵底游，暮為釜中烹。彼方路艱遠，其民亦天氓。餒之則為盜，非是惡厥生」，百姓與魚，皆造物者所生，同樣值得珍惜，因而詩末期許段希元：「捕多勿夸能，能在不犯兵」。(卷 259) 尤其宋代漁民普遍過著窮困的生活，<sup>65</sup>是以詩人「觀漁」之際對於漁民營生之苦亦有措意，如蘇軾（1037-1101）〈畫魚歌湖州道中作〉：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鉤畫水如耕犁。渚蒲披折藻荇亂，此意豈復遺鯢鮓。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萬一。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漁人養魚如養雛，插竿冠笠驚鵝鶩。豈知白挺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踈。<sup>66</sup>

吳人以長釘加杖頭，以杖畫水取魚，謂之畫魚，是湖州一種特別的捕撈技術；詩中描寫熙寧 5 年（1072）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將至湖州「以相度孫莘老（覺）議築松江隄堰」，<sup>67</sup>於道中親見「畫水取魚」的場面。蘇軾雖以文學知名，然其哲學思想亦自具特色，<sup>68</sup>解經著作有《易傳》、《書傳》、《論語說》三部，認為真正的仁愛是順於

<sup>63</sup>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 101，頁 304。

<sup>64</sup> 張瑞君：《楊萬里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15。

<sup>65</sup> 由宋詩中可見一斑，例如：袁說友〈舟人強以二鰲多取漁人之魚余增百錢與之作漁父行〉：「老人家住逢家洲，無田可種漁為舟。春和夏炎網頭坐，茫茫不覺秋冬過。賣魚日不滿百錢，妻兒三口窮相煎。朝餐已了夕不飽，空手歸去蘆灣眠。」（卷 2575）又范成大〈雪中聞牆外鬻魚菜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三絕〉：「飯糲驅出敢偷閑，雪脛冰鬚慣忍寒。豈是不能局戶坐，忍寒猶可忍饑難。憂渴焦山業海深，貪渠刀蜜坐成禽。一身冒雪渾家煖，汝不能詩替汝吟。啼號升斗抵千金，凍雀飢鴉共一音。勞汝以生令至此，悠悠大塊亦何心。」（卷 2267）又鄭剛中〈家有小園比他處果蔬倍登或問鄭子何術致此告之曰漢武帝使海上縣官親漁魚皆不出其後捐以予民則魚復來因知天之生物本以惠濟窮民彼富足者不可兼而得也吾貧甚矣安知造物者不以是少私之耶戲為一詩〉：「吾聞縣官漁海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復。天之生物豈無意，殆欲憐貧補不足。」（卷 1692）

<sup>66</sup> 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8，頁 398-399。

<sup>67</sup> 清·王文誥：《蘇軾詩集》，卷 8，頁 396，案語。

<sup>68</sup> 有關蘇軾哲學理論體系的論述，詳參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物理，「使物各安其所，然後厚之以仁。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sup>69</sup>因此，其仕途之升沉、出入，雖始終與王安石變法運動與黨爭緊密相關，但無論身處何境，總「以至仁為德」，<sup>70</sup>同情百姓，站在百姓立場發聲。<sup>71</sup>是以當詩人於寒天中見湖州漁人杖落藻荇橫生的泥中，因驚走百魚而所獲甚少時，不禁於詩末嗟嘆漁戶養魚、捕魚等生產活動的辛勤。清王文誥輯注更指出該詩：「末諷當時刑罰之煩也」，<sup>72</sup>認為還有諷諭時政的詩旨，就反對「新法」的蘇軾而言是頗可能有此用意的。又其弟蘇轍有和詩〈和子瞻畫魚歌〉云：

潛魚在淵不可及，垂餌投竿易如拾。橫江設網雖不仁，一瞬未移收百十。畫魚何者漫區區，終日辛勤手拮据。已嫌長網不能遍，肯信一竿良有餘。鯢鯢駭散蛟龍泣，獲少驚多亦何益。願從網罟登君庖，碎首屠鱗非所惜。(卷 852)

蘇轍注有《詩集傳》、《春秋集解》等，在經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仁愛思想與兄軾一樣，主張順物理而非揠苗助長：「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sup>73</sup>如此方可達「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sup>74</sup>的理想境界。歷任地方官時，亦能秉承儒家濟民愛物的民本思想，體察民瘼，同情農民，關注農事，有一百多首農事詩。<sup>75</sup>漁事亦屬農事範疇，上引詩作，詩人呼應其兄對漁民畫水取魚「辛勤」勞動卻仍經濟「拮据」的感傷，設網捕

第二章「究天人之際：蘇軾的哲學」，頁 140-224。

<sup>69</sup> 宋·蘇軾：《蘇軾易傳》，收入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第 1 冊（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卷 7，頁 351。

<sup>70</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道德〉，《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4，頁 132。

<sup>71</sup> 例如蘇軾元祐 4 年出朝任地方官後，與民瘼相關的奏狀特別豐富，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要求放免積欠，二、請求賑濟災傷，三、努力爭取朝廷的支援，以開展地方上興利除害的工程建設或其他事宜，並親自主持之。詳參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頁 400-403。

<sup>72</sup> 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頁 399。

<sup>73</sup> 宋·蘇轍：〈藏書室記〉，《樂城三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42 冊，卷 10，頁 824。

<sup>74</sup> 宋·蘇轍：〈歷代論·梁武帝〉，《樂城後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42 冊，卷 10，頁 650。按：此語原出《禮記·中庸》。

<sup>75</sup> 例如〈次韻王適大水〉：「投荒豈復有便地，遇災祇復傷羸軀。……鷄豚浪走不復保，老稚裸泣空長吁。」（卷 860）韋正春更將之分為三類：憫農詩、勸農詩、以農諷政詩，以見出蘇轍對農民的重視。詳參韋正春：〈論蘇轍的農事詩〉，《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8：6（2019.11），頁 99-106。

魚尚嫌漁獲不足，更何況是一竿一竿的辛苦畫水呢？比較特別的是，蘇轍卒章藉魚的口吻道出：寧願被「網罟」捕獲登上庖廚、碎首屠鱗，也不忍心見漁戶以畫水的方式辛苦取魚、難以維生。巧妙地傳達與其兄一樣的、憐憫湖州漁民苦於「獲少驚多」生計的仁愛之心。

## （二）由憂竭澤而棄取小魚

漁民設網捕魚，固然是著眼於生計，然而，若竭澤而漁，將魚一網打盡，反倒會造成無魚可捕的後果。早在周文王時即有此憂竭澤的生態永續觀，《逸周書·文傳解》記其臨終前交代太子云：「澤非時不入網罟，以長魚鼈之長；……畋漁以時，……是魚鼈歸其泉」，<sup>76</sup>要保護水域，依時捕魚以維持魚鱉的生長狀態；《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更指出「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sup>77</sup>的惡果。唐杜甫〈白小〉詩則進一步提出棄取小魚的主張：「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筐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sup>78</sup>從反對人們盡取「白小」（麩條魚）的具體行動主張，展現其維護水域永續的生態觀。

可惜杜詩中的主張在唐代並未得到太大的反響，直到宋代，日趨成熟的宋代儒學以其探究義理、格物致知的思想追求，對詩人的自然觀構成了強有力的引導和形塑，孕育了詩歌重思辨、重理性的新特質，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礎上融會儒、釋、道諸家思想，構建了一種尊重自然變化規律，平等地賦予自然物的思維。<sup>79</sup>宋代詩人「觀漁」，亦體現著此一尊重、平等的自然觀，<sup>80</sup>在承繼前人的觀點中更具體且普遍性地從憂竭澤、主張棄取小魚兩個面向，理性呼籲世人應使水族能永續生長的

<sup>76</sup> 晉·孔晁注：《逸周書》，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369冊，卷3，頁16-17。

<sup>77</sup> 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呂氏春秋新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83），卷14，頁146。

<sup>78</sup>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7冊，卷231，頁2551。

<sup>79</sup> 詳參王蕭依：〈宋代詩人的「觀物化」書寫及其自然觀〉，《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7:6（2021.11），頁167-169。

<sup>80</sup> 李春青進一步指出，宋詩「理性主義精神」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講求作詩為文之法，2.「以意為主」與「以理為主」，3.詩文評論的空前繁榮。詳參李春青：〈宋代詩學的基本精神與價值取向〉，《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87-92。而宋代「觀漁」詩所展現尊重、平等的自然觀，即李氏所指的「意」與「理」（中心思想）。

生態觀。首先，是擔憂密網捕小魚而致竭澤者，如：

插葦截灣流，寒魚未能越。安知罟師意，設網遮其闕。不須芳餌懸，何待清歌發。所獲勝綸竿，寧聞憂澤竭。(梅堯臣〈打魚〉，卷 247)

白頭老翁披敗蓑，求魚終日罩淮波。波深水闊望不絕，網目雖繁能幾何。大魚鱣鯪入淵底，小魚鮪鮓登網裏。手皸足趺吁可憐，何不為網大如天。(劉敞〈漁翁〉，卷 476)

西溪觀魚仍開樽，鳴榔隱隱沈烟村。吾人豈有竭澤意，瀕洞四際魚龍奔。驚潛初見穿亂藻，亟遁轉覺迷深源。向非驅迫群黨聚，罟罷徒使波濤渾。巨鱗足供數客飽，銀刀瑣碎不足論。吁嗟神物未變化，暴骨砧机寧非冤。(劉子翬〈打魚歌〉，卷 1914)

梅堯臣(1002-1060)出身貧苦，又長期身為下層官吏，對農民生活熟悉且關注，屢以詩歌反映民瘼、為民請命，相關詩作高達八百餘篇；<sup>81</sup>同時，笵文生〈梅堯臣略說〉一文言梅堯臣寫物能「進一步提出議論，這一點，給予後世更為重要的影響」，<sup>82</sup>上引〈打魚〉詩即可見詩人由觀打魚進而關注漁民生計來源並提出議論的長遠眼光，他指出罟師截灣設網的結果，雖所獲勝過綸竿，但恐將澤魚一網打盡而使明年無魚，藉此展現其反對設網捕魚的主張。至於前節已提及，與梅堯臣一樣動憂蒼生的劉敞，也在上引〈漁翁〉詩中傳達同樣的擔憂，詩人眼看漁翁以網目繁細的單網捕獲眾多小魚，卻無法捕到淵底的大魚，不禁發出「何不為網大如天」的呼籲，表面上是為小魚請命，實則為漁民永續的生計著想。還有劉子翬(1101-1147)，則是兩宋之際的重要學者，海內名士多所從遊，朱熹亦嘗從其問學；作品多反映現實，錢鍾書稱他是「詩人裡的一位道學家」，<sup>83</sup>高宗建炎 4 年(1130)通判興化軍(今福建莆田)，有

<sup>81</sup> 例如〈和資政侍郎湖亭雜詠絕句十首·漁艇〉：「古木剝為舟，野藤牽作纜。釣人寒雨中，遠望煙蕪暗。」(卷 247)道出捕魚人的辛勞與貧困。八百餘篇數目乃陳友冰統計所得，詳參陳友冰：〈論梅堯臣涉農詩的文學個性及其史學價值〉，《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3(2012.5)，頁 103。

<sup>82</sup> 〔日〕笵文生、笵久美子著，盧盛江編譯：《唐宋詩文的藝術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68。

<sup>83</sup> 錢鍾書言劉子翬是：「詩人裡的一位道學家，並非只在道學家裡充個詩人，他沾染『講義語錄』的習氣最少，就是講心理學倫理學的時候，也能夠用鮮明的比喻，使抽象的東西有了形象。」見錢鍾書：《宋詩選注》，頁 246。

善政，上引〈打魚歌〉即呈顯出他對漁業現實與漁民生計的關心，藉由為未長成的銀刀細鱗喊冤的方式，來表達反對漁人以「罩罷」等細密漁網捕魚導致竭澤的深意，其主要動機是出於對漁民往後漁獲來源的擔憂。

南宋詩人則將此擔憂更積極地化為肯定棄小魚、取大魚的實際漁事行動，如：

暗雨垂垂梅欲黃，春山吐源春漲狂。雪鱗頰尾泝流上，吹濤噴浪能奔忙。魚師布網名白大，萬目井井連重網。聯艘絕流勢甚武，遮羅初若無留藏。大魚已得小魚棄，要使遺育充陂塘。鰓鮪安用誤回避，蝦蟹亦復虛跳梁。寧知不比綸索手，欲以巧餌空滄浪。（沈與求〈觀網魚〉，卷 1675）

西北雲收廓太虛，東南風急放船初。冬深更許侯設鱸，地遠不譏公矢魚。白小未容登燕俎，紅鮮忽已間嘉蔬。重生鱗鬣浮江去，盡是先生所棄餘。自注：浙中有鱸殘餘，俗所謂銀魚是也。（朱翌〈閏月四日大風出靈鷲捕魚具鱸且約冬間再集〉，卷 1864）

沈與求（1086-1137）為宋南渡初期名臣，直言敢諫，風節挺立，為主戰派諫官，紹興 4 年（1134）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期間，「召集流亡，俾之復業」，「威德並行，內外綏安」，<sup>84</sup>可謂勤政愛民、治郡有方；又嘗因久旱不雨、莊稼枯槁，擔心有害秋收而上書乞求罷官。<sup>85</sup>清人吳之振謂與求「其詩喜論」，<sup>86</sup>上引〈觀網魚〉詩即以議論方式肯定漁師以重網萬目之網捕「白大」、棄小魚的舉措，並進一步解釋漁者棄小魚的目的在於「使遺育充陂塘」；詩末更警示鰓鮪等小魚切勿貪食能空滄浪的綸索巧餌，展現水域永續的環保意識。至於朱翌（1097-1167），治《周禮》，為秘書監屬，高宗喜其材，周必大〈朱新仲舍人文集序〉讚其「守睦（嚴州）、宣、蘇（平江府）等郡，俱有惠政」，<sup>87</sup>《寶慶四明志》亦言其「起知嚴州、寧國、平江府，撙節浮費，

<sup>84</sup> 以上二條引文，見宋·劉一止：〈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苕溪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63 冊，卷 30，頁 156。

<sup>85</sup> 宋·沈與求〈再與左相等乞罷政劄子〉云：「臣等比以旱暵之災，乞解機政，以答天戒。……迺中夏以來，亢陽如此，水泉將涸，禾稼向枯。陛下畏天恤民，憂形于色，禱祈備至，……儻不明正臣等之罪，亟加罷黜，則何以上弭天變，下塞人言？」見宋·沈與求：《龜溪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64 冊，卷 7，頁 230-231。

<sup>86</sup> 清·吳之振：《宋詩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243。

<sup>87</sup> 宋·周必大：《文忠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79 冊，卷 52，頁 539。

積緡錢四十萬於平江」，<sup>88</sup>頗有政績；上引朱詩則可見出其對生活與生態環境卓越的見識，不僅留意並肯定先生捨「白小」令其重生之舉，如此魚兒方能生生不息，漁獲來源亦將不虞匱乏，透顯出水域生態永續的可貴思維。

#### 四、個人情懷之觸動與抒發

《文心雕龍·物色》有云：「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sup>89</sup>物色能觸動詩人的心緒，連結至自身的出處境遇，從而將觸發的情懷發為吟詠。詩人觀漁亦然，眼前漁事能觸動其心，從而依其當時的處境而抒發內在的情懷。唐代相關之作僅見韓愈（768-824）〈叉魚招張功曹（署）〉一詩，他在欣賞叉魚人高超技藝與享受魚膾美味之際，觸發的並非如杜甫的惜生護生之念，而是因被捕魚兒們的濡沫之情興發對同遭官場打擊友人的勉勵之意，詩云：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撈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銷。星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翫。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饒。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事已遠。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烟冪冪，拂棹影寥寥。獺去愁無食，龍疑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鴉。<sup>90</sup>

此詩作於貞元 21 年（805）韓愈任陽山令、張署任臨武令之時。全詩以長篇文字書寫詩人置身漁場的臨場感，除了詳述魚兒的跳躍靈動、漁者的漁技非凡、競捕的激烈、得大魚的興奮等漁事過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韓愈雖藉魚兒們相濡以沫卻未

<sup>88</sup>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489 冊，卷 8，頁 129。

<sup>89</sup>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頁 693。

<sup>90</sup>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 10 冊，卷 343，頁 3839。

能登龍門之景況以觸發己身與友人張署友誼深厚卻同樣淪落之不平情懷，但仍於詩末以棄捐「憂累」、不須「問鴉」<sup>91</sup>的積極生活態度與友人共勉。

及至宋代，相關之作增多，書寫的情懷內涵也更為多樣，懷人之外，還有懷居，更有因漁人之自由、魚困漁網而興隱退之感者。但作品為數較少，僅約佔觀漁詩作的十分之一。此類詩的寫作背景多在詩人仕途不順、沉抑下僚之時，茲舉例說明如下：

### （一）懷人懷居

宋代觀漁詩的懷人之作，異於韓愈之思友，而多以家人為思念對象，往往藉「魚」為傳遞家書的信使。此書寫方式始見於秦漢時期的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sup>92</sup>而早在春秋時期，即有贈魚給當權者之例，且獻魚者往往會附帶一幅手書夾在魚中，以讓收物者更知曉獻魚者心意，遂漸漸形成贈魚與書信同行的風習，這是在「以食魚為貴意識基礎上形成的一種頗為特殊的傳遞書信的習俗」。<sup>93</sup>〈飲馬長城窟行〉中的信使「雙鯉魚」發展到宋代，早已形成文化積澱，詩人觀漁的同時，仍沿用雙鯉魚作為傳遞書信的信使，如北宋詩人之作：

野色星輝半有無，曲江舟子夜罾魚。紅鱗躍網無錢買，惆悵天涯尺素書。（孔武仲〈罾魚〉，卷 883）

腹腴端可飽耕硯，柳貫霜鱗照眼寒。莫惜寶刀煩玉腕，要看飛雪下金盤。

活我波間雙鯉魚，待傳千里故人書。嬌蛾莫道留君婦，怕捲珠簾摠不如。（謝邁〈觀漁二首〉）<sup>94</sup>

<sup>91</sup> 漢賈誼貶長沙，作〈鵬鳥賦〉，謂「鵬似鴉，不祥鳥也」，並對鵬發問：「請問於鵬，予何去之？」對未來茫然無所從。見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呂延濟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1），頁 254。

<sup>92</sup> 宋·郭茂倩：〈相和歌辭十三〉，《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 38，頁 556。

<sup>93</sup> 詳參楊澂：〈《飲馬長城窟行》中「雙鯉魚」與「烹鯉魚」的指意管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6（2001.12），頁 82-85。

<sup>94</sup> 宋·謝邁：《竹友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52 冊，卷 5，頁 579。

孔武仲（1042-1098），為北宋文壇與政壇的重要人物之一，學識廣博，剛正敢言，因反對新法，30年的宦途便在黨爭的泥淖中沉浮進退。文學方面，他曾在多篇詩集序中主張感物吟志的創作理論，<sup>95</sup>且落實至創作實踐上亦多政壇沉浮、仕途輾轉過程中有感於外物而發之作，上引〈罾魚〉即其夜半觀「罾魚」所生發的感懷，詩人由眼前「紅鱗躍網」的景象聯想到可藉魚傳遞家書，但隨即發現無錢購買漁獲，家書無由寄出，「惆悵」之餘只能藉「尺素書」之典含蓄傳達對家人「長相憶」的悠悠情思。至於謝邁（1074-1116）曾舉進士不第，家居不仕。他雖身為布衣，詩作又不多，品格卻清高淡泊且具真性情，例如〈寄饒次守〉除讚揚饒次守人品外，還說：「它日如買鄰，定可連牆住。頗聞君卜婚，我亦未有婦。要如子柳子，各娶老農女。……兩家如有子，男女互嫁娶」，<sup>96</sup>勸次守早日歸鄉，並約為鄰為親家，展現對朋友的真性情。而上引〈觀漁二首〉展現的是他對情人的真性情：詩人不僅以「寶刀煩玉腕」、「飛雪下金盤」等精鍊詞句與創新語言來形容其觀漁享膾的情趣，還進一步活用傳統「雙鯉魚」傳信的意象，期盼能令「雙鯉魚」存活，以作為傳遞給千里外情人書信的信使，含蓄中見真情。

南宋以後，因戰事頻仍之故，詩人於輾轉遷徙之際觀漁，則易觸發其懷鄉之思，如張嶠（1096-1148）因觀看類似家鄉漁事而觸發去國懷鄉之幽情，極為動人，〈雪中泛漢水觀捕魚〉云：

既游天漢地，復泛清漢流。我本襄漢人，對酒集百憂。是時雲氣昏，雪片迷汀洲。沉沉百丈潭，坐看漁子游。重裘憫渾脫，得雋憐深投。舞空清渚迴，遍積修篁幽。山川疑舊里，歌舞迷新游。薄暮理歸棹，中流任夷猶。忽驚在鄉社，誰辨陰成樓。歛知非舊邦，沈瀾涕難收。（卷 1838）

「天漢」指蜀地；由詩題與開篇二句可知，此詩寫作時間在冬季、地點在詩人出蜀

<sup>95</sup> 例如〈興國僧房詩序〉：「自二月至於五月，得三十八篇，錄於左方。既而受牒吏部，得縣為湖南，繇所館晨出南薰門以望九江道，途所得又三十五篇，亦附於後。……其感於物，動於心，發於言，不為譏嘲以忤群眾，從容自道而已，亦詩人之志也與？」宋·孔武仲：《清江三孔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387 冊，卷 15，頁 343。又〈柳師聖詩集序〉：「三十年間，目覽心矚，感於中，觸於外，欣歡愁戚必發之於詩。」宋·孔武仲：《清江三孔集》，卷 15，頁 345。

<sup>96</sup> 宋·謝邁：《竹友集》，卷 4，頁 577。

後的漢水流域。張嶠本為光化軍（今湖北襄陽老河口）人，建炎 2 年（1128）正月，時任房州司法參軍，因金兵進逼鄧州，後攻下房州，遂挈家輾轉上庸（今湖北竹山縣）、鄖鄉縣（今湖北鄖縣），後入蜀，寓居於達州。<sup>97</sup>紹興 4 年（1134）秋自達州取長江水路出川，<sup>98</sup>翌年 4 月底到臨安。<sup>99</sup>詩人本身為襄漢人，寫此詩時（紹興 4 年冬）仍身處漢水流域，是以冬日觀漁所見山川與漁事，皆與家鄉相似，令其恍如置身鄉井；然而，張嶠旋即察覺已離故鄉有一段距離，回到現實後不禁潸然淚下。張嶠生活於北宋末、南宋初之社會交替時期，政治動蕩，故多「顛沛流離、身世之慨」之作，<sup>100</sup>紀昀嘗稱其五言古詩、絕句「氣體高朗，頗足以自名一家。」又云：「克莊《後村詩話》謂其詩句法與簡齋相似而於五言詩尤極，賞其語意高簡，意味深遠。」<sup>101</sup>試觀上引詩作，果能以高雅深刻的語言表達去國懷鄉的幽思，情韻動人。同時，此詩以「是時雲氣昏，雪片迷汀洲。沉沉百丈潭」等沉重之景，寫其先「疑」、再「驚」、終「涕」等由迷離恍惚而沉重的昏亂心境，這種「景」與「情」密切交融的作法，成功地達至周振甫所謂「寫景和抒情沒有一定規格，但必須情景相生，緊密呼應，來加強所表達的感情」<sup>102</sup>之藝術效果。

詩人觀漁，除了關懷己身的家人與家鄉外，還能將這份關懷推擴至他人，例如釋居簡代漁民懷地方官，〈西湖夜歸觀打魚懷趙京兆（代人）〉云：

德人天游樂者全，亦以此樂均魚鳶。陶然亦復忘所樂，西湖澄澈如心淵。管領西湖人不少，前後無如趙京兆。至今畫手畫西湖，不著綠蓑人獨釣。胡為今夜月滿湖，大船小船皆得魚。魚登罔罟叫不得，那知老子今歸歟。滔滔京

<sup>97</sup> 張嶠〈先夫人歸附誌〉：「始某奉先夫人避地上庸山間，紹興二年夏，盜賊寢偪，遂奉入蜀，寓居於達州。」宋·張嶠：《紫微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62 冊，卷 35，頁 877。

<sup>98</sup> 王可喜、王兆鵬據嶠過雲安軍時之詩句：「不聞鶉鳩鳴，蕭蕭山樹悲」（〈過雲安縣〉），推知時令在秋天。參王可喜、王兆鵬：〈宋南渡詩人張嶠早期事蹟考〉，《江漢論壇》12（2017.12），頁 89。

<sup>99</sup> 由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五年五月丙子（初三日）」載：「嶠，……以薦召對，遂除秘書省正字。」可知張嶠至遲在紹興 5 年 4 月底已抵臨安。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 1479。

<sup>100</sup> 羅曉憶：〈宋人張嶠詩歌簡論——以張嶠避難均州、房州詩歌創作為例〉，《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5：2（2015.4），頁 9。

<sup>101</sup>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卷 156，頁 4045。

<sup>102</sup> 周振甫：《詩詞例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情景相生」，頁 130。

兆萬人海，平地翻濤渺無蓋。活魚之外尤活人，人在甘棠頌遺愛。(卷 2791)

釋居簡(1164-1246)為南宋臨濟宗著名的文僧，喜交游文士，嘉熙中(約 1239)擔任淨慈寺第三十七代主持，<sup>103</sup>寺位於杭州西湖南岸，故上引詩可能作於此時期，寫詩人一次夜歸西湖時觀人打魚的經驗，因大船小船均喜得魚豐收，當地漁民極懷念曾管領西湖且政績非凡的「趙京兆」，遂代漁民發聲，以詩歌頌其恩德與「遺愛」。由於臨安府為南宋首都，地位重要，多以宗室士大夫任知府，嘉定至嘉熙年間的臨安知府姓趙的，據梅哲浩的研究有：趙時侃、趙立夫、趙與權、趙與懃等人，<sup>104</sup>雖然詩中「趙京兆」究指何人仍有待進一步考察，但至少可見出釋居簡世俗化、待人誠懇的一面，宋詩人方回稱他：「古詩頗瘦而詩題多俗士往來」，<sup>105</sup>許棐〈贈北磻〉有「對客敬如堂上佛」<sup>106</sup>之讚語，亦可得到印證。

## (二) 隱退之想

漁人撒網打魚、來去自由的景象，能引發詩人掙脫塵俗桎梏、追求自由生活的隱退之想，如劉攽〈蔡河漁叟〉：

河冰始消春沮洳，老翁求魚日來去。川流容船網罟繁，上流下流密如霧。跳蝦潛斗不自惜，時復鯢鮪聊可識。吁嗟勞心能幾何，信道相看猶羨他。(卷 605)

劉攽雖刻苦勵學，博覽群書，有名於時；但「為人疎儻，不修威儀」，<sup>107</sup>經常出語無忌，開罪於人，又因反對新法，以致雖為官有方、治民有術，卻仍多遭訕謗、沉抑

<sup>103</sup> 釋居簡於宋孝宗淳熙 10 年(1183)左右受戒出家，先後於閩中、明州、靈隱寺掛錫；嘉泰 3 年(1203)於台州般若寺任住持，後於靈隱寺居第一座。詳參紀雪娟：〈宋釋居簡生平與《北磻文集》版本考述〉，《宋史研究論叢》20(2017.9)，頁 383-384。

<sup>104</sup> 其任期分別為：趙時侃(嘉定 5 年 8 月 4 日至 8 年 10 月 15 日，任期 3 年 2 個月)、趙立夫(紹定元年 12 月 12 日至 3 年 12 月 3 日、端平 2 年正月 19 日至 5 月 9 日，任期 2 年 4 個月)、趙與權(端平 3 年 9 月 21 日至嘉熙元年 12 月 26 日、嘉熙 3 年 6 月 2 日至 4 年 5 月 18 日、嘉熙 4 年 8 月 25 日至淳祐元年 4 月 21 日，任期 2 年 11 個月)、趙與懃(嘉熙 3 年正月 18 日至 6 月 2 日，任期 5 個月)。參梅哲浩：《南宋臨安知府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20)，頁 92。

<sup>105</sup> 宋·方回：《瀛奎律髓》，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409 冊，卷 47，頁 535。

<sup>106</sup> 宋·許棐：《梅屋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218 冊，卷 1，頁 204。

<sup>107</sup> 元·脫脫等：〈劉攽傳〉，《宋史》，卷 319，頁 10388。

下僚、仕途偃蹇。<sup>108</sup>上引詩即流露出此屢遭現實挫折後欲掙脫官爵束縛的自在之想，詩人見漁叟每日雖在川流中辛苦捕魚，但以繁密如霧的網罟求魚卻有不錯的漁獲，而且比起政事的「勞心」，詩人更為羨慕漁人的生活，正如其〈漁翁〉詩所云：「人生如此亦自由，何用車馬稱公侯」（卷 604），因為內心「自由」才是最可貴的。又如兩宋之際的汪藻（1079-1154）與韓駒（1080-1135）之觀漁，亦對打魚生涯的逍遙無累深致嚮往，詩云：

霜颺落木瀟湘秋，黃蘆颯颯秋江頭。漁翁短棹搖輕舟，夕陽斜照寒波流。篷  
蓑笠笠興夷猶，得魚沽酒更勸酬。生涯一葉水上浮，市朝利病不相謀。青山  
綠水得魚游，此樂未必饒公侯。畫圖忽見清兩眸，恍疑身在滄浪洲。年來萍  
梗嘆滯留，擬欲與子為朋儔。（汪藻〈觀秋江捕魚圖〉，卷 1434）

城西鼓楫又城東，不待溪分上下風。碧樹垂柑間黃綠，冰盤行鱸簇青紅。橫  
塘日暮林巒合，斷岸秋來浦溆通。安得此身無世累，便隨漁艇入空濛。（韓駒  
〈次韻南溪觀魚〉，卷 1442）

汪藻是北宋末、南宋初知名的文學家、史學家，曾拜韓駒為師，具有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與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先後任婺州觀察推官、宣州州學教授，又改江西提舉，期間受江西詩派詩人推重，交游唱和頻繁。可惜，遭昔日太學時結怨的王黼打擊，之後即仕途坎坷，輾轉各地為官；晚年更因譏諷秦檜子秦熺狀元及第而遭彈劾被貶落職永州，死於永州貶所。<sup>109</sup>仕途不遇令他感到人生無常，渴望擺脫束縛、回歸自然，因此，上引詩作中所呈顯的青山綠水中漁翁從容得魚之樂，便是他意欲掙脫現實桎梏、隱身漁家的理想追求；「年來萍梗嘆滯留」，也是他飽受宦海風浪的心靈寫照。至於韓駒，早年從蘇轍學，轍讚其章法細密有致如「行針布線」；<sup>110</sup>他出身於仕宦之家，為江西詩人中享有盛名者，然因學出蘇氏，被目為元祐黨人而倍受新

<sup>108</sup> 劉敞自慶曆 6 年（1046）中第之後，即開始近二十年的游宦生涯，歷仕鳳翔判官、汝州推官、江陰主簿、廬州推官等職，可謂沉抑下僚、仕途偃蹇；直至仁宗嘉祐 8 年（1063）始為國子監直講，然其性格好諧謔，屢開罪於人，又反對新法，終遭王安石斥通判泰州。詳參元·脫脫等：〈劉敞傳〉，《宋史》，卷 319，頁 10387-10388。

<sup>109</sup> 參元·脫脫等：〈汪藻傳〉，《宋史》，卷 445，頁 13132。

<sup>110</sup> 宋·曾季狸：《艇齋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21。

黨打擊，自徽、欽到高宗，歷官京師、蒲城、分寧以及黃州等地，宦海浮沉，時揚時抑，故其詩中屢現嚮往隱逸的情懷。尤其在分寧期間，與諸多高僧大德密切往來，以詩談禪，以禪論人生，對脫離俗世之累更加渴切，〈示龜山平老〉詩即有「尤覺是身多世累」（卷 1442）之語，與上引詩中「安得此身無世累」同樣的透顯出隱退之想。詩中妙用黃與綠、青與紅等對比色，將漁人漁艇鼓楫、冰盤行鱸的逍遙生涯，襯托得熱鬧繽紛，此漁樂遠勝過官場的傾軋鬥爭。因此，當高宗即位、命韓駒知江州時，韓駒拒絕接受，而選擇歸隱民間，最後定居撫州臨川，過著與名士酬唱的閑適生活，真切地實踐了詩人心中的理想。

至於南宋詩人觀漁的隱退之想，則是因見魚在密網中掙扎難逃，便覺如人困於世網、官網中，這可能與詩人身處動蕩的時代背景有關，一如同樣身處亂世的張華有「輕縉拂素霓，織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竄，歸鴈不得還」之句，從而得出「遊放使心狂」、「檢跡投清軌」<sup>111</sup>的隱退領悟；宋詩人劉子翬也有感於魚因貪餌而自投羅網之悲而興發歸鄉隱退之思，其〈打魚歌〉云：

江湖萬里厭游泳，失地斗水能為恩。臨流解網意亦厚，誘以芳餌仍爭吞。因悲搖尾向數罟，豈異俯首縻華軒。慨然投箸起太息，歸思已逐冥鴻鶩。（卷 1914）

劉子翬，父劉韜在靖康之難時出使金營，因拒降而自縊死；子翬以父蔭補承務郎，被聘為真定（今河北正定）幕府；宋室南渡後，通判興化軍，因不勝吏事，「以羸疾丐祠，歸隱屏山」，<sup>112</sup>主管沖佑觀，講經傳道。上引〈打魚歌〉也從「觀漁」的視角透顯他對宦海與社會動蕩現實的無奈與悲嘆：劫後餘生的游魚未能記取教訓，仍爭吞芳餌、搖尾向數罟，正像人類寧可卑躬屈膝以追求高官厚祿一樣可悲。因此，詩人慨然投箸嘆息，興發不如歸去之思。又陸游（1125-1210）亦有類似之作，〈冬日觀漁獵者〉云：

人閑漁獵各相從，南陌東阡處處逢。繡羽觸機餘耿介，錦鱗出網尚噉喙。傍

<sup>111</sup> 晉·張華：〈遊獵篇〉，逄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613。

<sup>112</sup> 清·吳之振：《宋詩鈔》，頁 1381。

觀扶杖常移日，就買還家足御冬。更待風霜都過盡，却從春野看春農。（卷 2179）

陸游生存的 85 年歲月中，正是宋金戰火不斷、人民備受苦難的時期，一貫堅持對金作戰的陸游，在宦途上一再受挫，曾四度罷官回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之家鄉。<sup>113</sup>此詩作於紹熙 3 年（1192）11 月陸游第四度罷官後，時年 67，早在淳熙 13 年（1186）時陸游雖除朝請大夫知嚴州，但孝宗卻對他說：「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意謂莫談國政和抗金問題；淳熙 15 年（1188）孝宗再召入見，仍對他說：「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sup>114</sup>遂除軍器少監，始終沒有重用他的意思。因此，上引詩中的飛禽觸機、魚兒困網，看在詩人眼裡，正如有志之士偃蹇於人世的「風霜」；殺敵滅虜的理想既不可實現，只好隱退家鄉，過著「卻從春野看春農」的生活以渡其餘生。

## 五、結語

由於宋詩較唐詩更富敘述性、更接近日常生活，其「觀漁」詩由唐的五首驟增至一百多首，且其意象書寫呈顯出漁事描繪更具體、多元，情意抒發更深刻、豐富的特徵：（一）自「游觀」意象言，唐詩未能具體描述漁法，詩意亦較隱晦；宋詩卻能具寫特殊漁法，並寄寓詩人的施政思維與態度；而南宋詩更增添國族危機感與邊政思考。（二）自「惜生」意象言，唐詩以魚之不幸遭遇生發勸戒殺生縱樂之意，成為後代「惜生」主題書寫的典範；宋詩則將此關懷由魚推擴至人；南宋詩更深刻譴責人類為私慾而對魚趕盡殺絕的貪婪與違反天理，並積極主張棄小魚、取大魚的漁事行動。（三）自「抒懷」意象言，唐詩以被捕魚間的濡沫之情興發對同樣沉抑下僚

<sup>113</sup> 陸游曾遭四度罷官，分別為：高宗紹興 31 年（1161）、孝宗乾道 2 年（1166）、孝宗淳熙 7 年（1180）、淳熙 16 年（1189）。參儲東潤：〈前言〉，《陸游傳》（臺北：國際文化事業公司，1985），頁 1-5。

<sup>114</sup> 以上二條資料皆見元·脫脫等：〈陸游傳〉，《宋史》，卷 395，頁 12058。

友人的勉勵之意；宋詩於懷人之外還有懷居、隱退等多樣情思；尤其南宋因受外族威脅、戰事頻仍，於輾轉遷徙之際又增懷鄉之思。

上述宋詩「觀漁」意象之義蘊，還可從下列三個視角具體考察宋型文化的內涵特徵：（一）海洋文化視角：「觀漁品膾」至宋代已由古代祭禮轉而為文人的休閒娛樂活動，透顯出與民同樂的文化精神與品嚐生魚膾的流行食魚文化；宋代「鸕鶿漁法」、「旋箔漁法」、「聯合捕魚」等漁法之奇觀最能吸引詩人的目光；理學思潮則使宋詩人具有不竭澤而漁與應以疏網棄小魚、取大魚以使水域永續的生態意識，呈顯鮮明的「理性主義精神」。（二）思想視角：廖肇亨曾云：「嚴格來說，性情、才能固然重要，但特殊的見聞經歷，也是優秀作品膾炙人口的必要條件。」<sup>115</sup>同樣地，宋代知名詩人所見聞的特殊「漁法」，的確能觸發詩人的心靈以寄託其寓意於詩篇，而成為上述詩作膾炙人口的必要條件，其寄寓的思想情意主要有：不與民爭利之仁心、強烈的用世之心、戮力從公、百姓為先、敬物惜生等「淑世精神」，以及隱退逍遙、幽默樂觀、懷人懷居等「揚棄悲哀」<sup>116</sup>的人生態度與情感。（三）詠物詩學發展視角：宋「觀漁」詩除了少數著重抒情詠懷的內涵書寫外，大多皆實寫詩人游觀所見漁法以寄寓其施政姿態或用意，以及書寫其觀魚之不幸與人之暴殄生靈以生發惜生戒殺之議論，不僅印證了張高評「唐人詠物，加之以抒情詠懷；至宋，則側重托物寓意，藉物說理」之主張，也具體見出宋詠物詩之於唐詩「合少離多」<sup>117</sup>的「創新」<sup>118</sup>精神。

因此，從「觀漁」的側面，我們具體看到宋詩所體現的理性主義、淑世、樂觀、寫實與創新等宋代文士特有的精神風貌。

<sup>115</sup> 廖肇亨：〈清代中葉古典海洋詩歌蠶探：以嘉慶五年琉球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的海洋體驗為中心的考察〉，《海洋文化學刊》8（2010.6），頁27。

<sup>116</sup> 詳參〔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頁25-30。

<sup>117</sup> 程千帆〈模擬（論模擬與創造）〉：「以今作與古作相較，第其心貌之離合：合多離少，則曰模擬；合少離多，則曰創造。」程千帆：《文論十箋》下輯，頁227。

<sup>118</sup> 李春青論及宋詩「創新」精神的來源，曾云：「宋代士人主體精神的重新挺立不僅使他們積極入世並熱衷於學術話語的建構，而且還賦予他們一種不甘居於人下、落於人後的開拓精神。……在宋代，這種惟我獨尊、傲視古今精神是極為普遍的，是時代風尚。其見之於詩學，則表現為一種可貴的創新精神。」李春青：〈宋代詩學的基本精神與價值取向〉，《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頁85-86。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呂氏春秋新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83。
- 晉·孔晁注：《逸周書》，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36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呂延濟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1。
-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
- 唐·高適：《高常侍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101冊。
- 五代·孫光憲著，林艾園校點：《北夢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孔武仲：《清江三孔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387冊。
- 宋·方回：《瀛奎律髓》，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409冊。
- 宋·方岳撰，秦效成校注：《秋崖詩詞校注》，合肥：黃山書社，1998。
- 宋·朱彧：《萍洲可談》，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065冊。
- 宋·吳自牧：《夢梁錄》，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598冊。
- 宋·宋祁：《景文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117冊。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57。
- 宋·沈與求：《龜溪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164冊。

- 宋·周必大：《文忠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79 冊。
-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602 冊。
- 宋·袁說友：《成都文類》，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396 冊。
- 宋·張嶠：《紫微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62 冊。
- 宋·許棐：《梅屋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218 冊。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
- 宋·陳師道：《後山集》，收入《後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宋·曾季狸：《艇齋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趙汝適：《諸蕃志》，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602 冊。
- 宋·劉一止：《苕溪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63 冊。
- 宋·劉攽：《彭城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25 冊。
- 宋·謝邁：《竹友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52 冊。
- 宋·魏泰著，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885 冊。
-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489 冊。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蘇軾：《蘇軾易傳》，收入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 宋·蘇轍：《欒城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42 冊。
- 宋·蘇轍：《欒城三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42 冊。
- 宋·蘇轍：《欒城後集》，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1142 冊。
-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

-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600 冊。
- 明·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13。
- 清·王士禛：《居易錄》，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第 889 冊。
-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83。
- 清·吳之振：《宋詩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黃生：《杜工部詩說》，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
-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
-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二、近人論著

- 于北山：《楊萬里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 王水照：《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王可喜、王兆鵬：〈宋南渡詩人張嶠早期事蹟考〉，《江漢論壇》12（2017.12），頁 86-90。
- 王蕭依：〈宋代詩人的「觀物化」書寫及其自然觀〉，《中南大學學報》27:6(2021.11)，頁 167-176。
- 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 李春青：《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 李澤厚：《美學論集》，臺北：三民書局，1996。
- 邢湘臣：〈我國古代幾種特殊的漁法〉，《農業考古》1（1986.4），頁 249-251+404。
- 周振甫：《詩詞例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 段銳超：〈「觀漁」之禮的興衰及其深層原因探究〉，《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6：6（2014.12），頁 117-121。

- 紀雪娟：〈宋釋居簡生平與《北磻文集》版本考述〉，《宋史研究論叢》20（2017.9），頁 383-384。
- 胡傳志：〈論楊萬里接送金使詩〉，《文學遺產》4（2010.7），頁 62-69。
- 韋正春：〈論蘇轍的農事詩〉，《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8：6（2019.11），頁 99-106。
- 徐國能：〈杜甫歌行詩後世模擬析論——以〈觀打魚歌〉、〈又觀打魚〉為例〉，《文與哲》26（2015.6），頁 181-226。
-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 張瑞君：《楊萬里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梅哲浩：《南宋臨安知府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20。
- 陳友冰：〈論梅堯臣涉農詩的文學個性及其史學價值〉，《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3（2012.5），頁 103-113。
- 陳憲春：〈從唐代詩人詠漁具談行漁工具的衍化與發展（上）〉，《漁業機械儀器》8（1988.8），頁 16-18。
- \*程千帆：《文論十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黃永武：《中國詩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 \*楊希牧：《先秦文化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 楊瑞堂：〈我國古代捕魚技術的研究〉，《古今農業》2（1989.7），頁 120-126。
- 楊皚：〈《飲馬長城窟行》中「雙鯉魚」與「烹鯉魚」的指意管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6（2001.12），頁 82-85。
- 廖肇亨：〈清代中葉古典海洋詩歌釐探：以嘉慶五年琉球冊封使趙文楷、李鼎元的海洋體驗為中心的考察〉，《海洋文化學刊》8（2010.6），頁 1-32。
-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 儲東潤：《陸游傳》，臺北：國際文化事業公司，1985。
- 魏天安：〈宋代漁業概觀〉，《中州學刊》6（1988.12），頁 108-112。
- 羅曉憶：〈宋人張嶼詩歌簡論——以張嶼避難均州、房州詩歌創作為例〉，《鄖陽師

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5：2（2015.4），頁 9-13。

蘇永霞：〈從《全唐詩》看唐代漁業〉，《農業考古》8（2010.8），頁 219-227。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日〕笈文生、笈久美子著，盧盛江編譯：《唐宋詩文的藝術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 Peking University, *Quan Song Sh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ong Poem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heng Qian Fan, *Wen Lun Shi Jian* [Ten Notes on Literary Theory]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1).
- Li Chun Qing, *Song Xue Yu Song Dai Wen Xue Guan Nian* [Song Studies and Literary Ideas in Song Dynasty]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Li Ze Hou, *Mei Xue Lun Ji* [Esthetics]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1996).
- [Qing] Qing Sheng Zu, *Quan Tang Sh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m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Yuan] Tuo Tuo, *Song Shi*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Taipei: Dingwen Press, 1994).
- Wang Shui Zhao, *Wang Shui Zhao Zi Xuan Ji* [Selected Collection of Wang Shui Zhao]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0).
- Yang Xi Mu, *Xian Qin Wen Hua Shi Lun Ji* [Anthology of Pre-Qin Cultural Hist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5).
- Yoshikawa Kojiro, Zheng Qing Mao translated, *Song Shi Gai Shuo* [Introduction to Song Poetr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Zhang Gao Ping, *Song Shi Zhi Xin Bian Yu Dai Xiong* [New Changes and Majestic in Song Poetry] (Taipei: Hongye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5).